

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

——话说谢冕先生的三重身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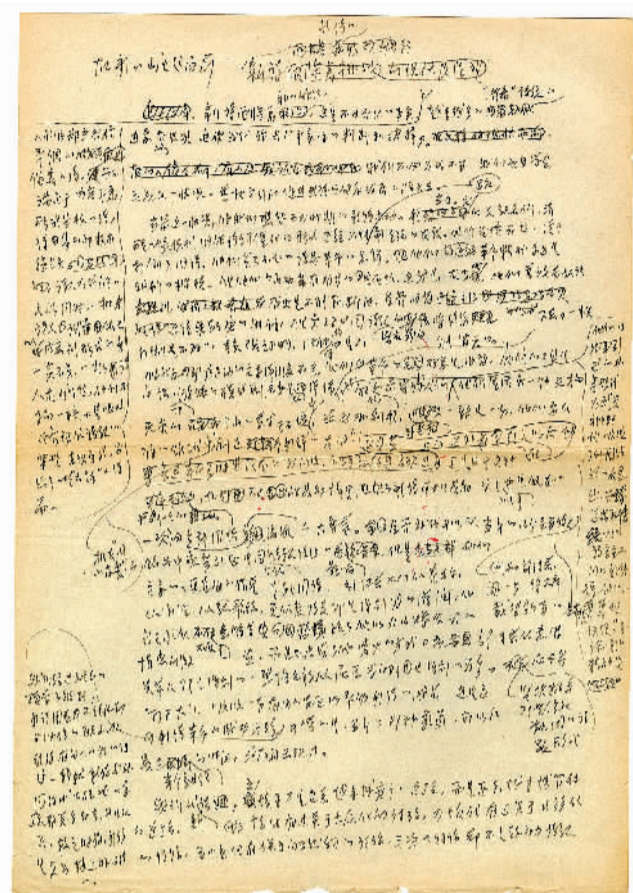
李 舫

谢冕先生今年90岁了，一辈子没离开过中国新诗。他写诗、评诗、教诗、选诗、研究诗，为中国当代诗歌作出了卓越贡献。谢冕先生有三重身份，但他的价值，又不仅在于这三重身份。他的存在与思考，他自由奔放、恬淡怡然、包容开阔、无拘无束、温柔清澈的灵魂，是我们能够拥有的真正财富。

——编者



谢冕在冰岛



谢冕《在新的崛起面前》手稿

20年前的3月24日，谢冕先生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纪念闻一多的文章《追求学养与人格的统一》。他在这篇文章中回忆得知闻一多牺牲的消息时说：

那时间一多先生给予我的启发还不是诗和学术，而是他的人生追求和理想精神——他认定了一个真理，明知前面是火刀刀山，他也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。他就是这样在黎明到来前的最黑暗的时刻，把鲜血洒在了昆明街头。他的献身精神感动了我，使我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庄严的和崇高的。后来我年龄渐长，懂得的东西也多了，才知道作为诗人、艺术家和学者的闻一多，才知道他的伟大的创造精神如海洋般的渊博。

谢冕先生在精神上、人格上推崇闻一多，是因为他看到了“闻一多做学问，到底也是为了做人。做学问的最终，也旨在改善人生，改造社会，使人类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”。谢冕视闻一多为人生偶像，从而在诗歌、文学、教育、美育等领域辛勤耕耘，旨归在把诗歌的真善美播撒到人间，让世人领略中国新诗的万丈光芒。这种价值追求成就了谢冕，也成就了新中国诗。

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，谢冕先生有三重身份。他的这三重身份，对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，具有直接而亲切的意义。

中国诗坛的领路人、当代诗歌创作的护航人，是谢冕先生当之无愧的第一重身份。

1980年5月8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谢冕先生的文章《在新的崛起面前》。

前》。在反对声充斥文坛的时刻，他慧眼识珠，敏锐地发掘出“朦胧诗”所具有的创新性、探索性及其尚未完全展露的生命力，呼吁诗坛要对其予以支持。这篇文章的划时代意义在后来得到证明，如今它已是当代诗歌批评史上的经典文献。《在新的崛起面前》体现出谢冕鲜明的诗歌主张，即对“人的解放”的呼唤。谢冕把“朦胧诗”与“五四”新诗运动衔接起来，把“朦胧诗”的崛起，看成是对“五四”诗歌传统的一种回归。他热情讴歌自由创作，对年轻的艺术革新者给予真诚的、全力的支持，在当时以巨大的勇气发出了清醒的声音，为年轻的艺术探索者争得了较为宽松的创作空间。他后来对“新生代”诗歌的崛起，也是支持的。这种敏锐的判断力、自由宽广的艺术观、真诚耿直的性格，使他成为中国诗坛的一位领路人、护航人。

百年中国新诗杰出的研究者和批评家，是谢冕先生的第二重身份。无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批评家，他都为当代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。

谢冕先生著有多种诗论著作，如《论诗歌》。他的诗歌理论立足于中外诗歌和史论的广阔基石上，独到博引，思想精深，具有相当的独创性。他还有经营十年之久的著作——《中国新诗史略》。谢冕热情地将诗歌的发展称为是“一百年的大事”，将百年新诗界定为是“始于‘破坏’而指归于建设的一百年”，是看似‘后退’而立志于前进的一百年”，证明也总结了百年新诗艰苦卓绝的发展过程。这本书着眼于百年新诗演进的脉络及问题，充分体现了他对新诗独特的感受和判断以及对全局的把握能力，是一部真正的诗史。这无疑也是谢冕大半生心血凝注的集大成之作。

谢冕先生在世纪之交创造性地提

出了“百年中国文学”的概念。在这种新史观的视野下，他先后主编《中国文学百年梦想》《百年中国文学总系》等系列丛书，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，做出了坚实的贡献。他说：“新诗在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目标时，一方面要不断抗击来自复古势力的骚扰，即假借农民或民族意识的名义对于改造更新自身的阻挠；一方面，则要不断宣扬向着世界新文艺潮流认同的现代思维和现代艺术实践。”

谢冕先生还发起创办了第一个诗歌理论刊物《诗探索》，亲任主编。中国诗歌研究界的学者，几乎都在这份很有分量的刊物上发表过重要的诗学论文。在办刊指导思想上，他强调“高举艺术探索的旗帜，站在引领诗歌变革潮流的前沿”。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，他主张开放与宽容。正是由于谢冕坚持学术自由，坚持以多元共存，以竞争求发展，《诗探索》才团结了一批不同年龄层次的诗歌评论家，为新时期的诗歌理论批评造就了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。这份刊物至今仍是诗歌界富有影响力的诗歌和诗学刊物。

谢冕先生说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：“我一辈子只做文学，文学只做了诗歌。”这是他自谦的话。但是毫无疑问，在他90年阔大的生命航程中，他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，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批评引导，都倾注了大量精力，取得了丰硕成果。谢冕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领路人、推动者、见证者。

谢冕先生的第三重身份，是他作为杰出的诗选家和教育家，通过言身教，让无数桃园弟子和诗歌爱好者得以沐浴到中国新诗的光风霁月。

《中国新诗总系》是新诗发展历程和作品集中展示的一部经典选本，突出历史与审美的双重标准，并将每卷的序文合集成《百年中国新诗史

略》。编选者以历时性为编选原则，根据创作状况和时间的不同来划分诗人群落，形成流动的动态诗史，如芒克、多多等诗人既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卷中，也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卷中，由此看出诗人创作的时间跨度。后来的编选者又对百年来中国诗歌理论进行收集和整理，集成了《中国新诗总论》，为新诗史学构建奠定了基础。

孔子说：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此言不虚。谢冕先生为诗歌评论界和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。他不仅在北京大学传道解惑、言传身教，培养了一批当代文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，还于推动研究和教学的考虑，自1989年10月起创办“批评家周末”，组织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开展研讨活动。很多青年学者和青年教师，都参加了这一定期活动。“批评家周末”作为教学、科研的一种补充形式，倡导学术民主、思想自由的对话方式，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的众声喧哗中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纯正学院风格。这不仅提高了研讨活动的学术质量，同时也为青年学人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。

谢冕先生的价值，其实不仅仅在于这三重身份。他常常感喟“有些诗歌正在离我们远去”，呼吁“新诗要与古诗和解”，慨叹“我的人生哲学是整体的悲观主义和局部的乐观主义”……他的存在与思考，他自由奔放、恬淡怡然、包容开阔、无拘无束、温柔清澈的灵魂，是我们能够拥有的真正财富。宋代大诗人范仲淹赞美严子陵时曾说：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这其实正是对谢冕先生及无数如谢冕先生般“先生”们的最高赞誉，更是对广大“后生”的鞭策与警醒。

带读者领略文学名家风采

本报记者 张鹏禹

灿若星辰的文学名家，不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口口相传的名篇佳作，更以他们为人文的高尚品德影响世人。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主任慕津锋从事文物文献资料征集工作20余年，因工作原因，曾与诸多德高望重的文学名家交往甚笃。他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，写成《难以忘记的文学名家》一书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《难以忘记的文学名家》收录作者回忆文章19篇，其中写到被称为“民国最后一位才女”的杨绛、“汉语拼音之父”周有光、“红学大师”冯其庸、中国戏曲理论大师郭汉城、“蜀中五老”之一的马识途、温文尔雅的诗人居岸、“当代谈迁”王火、“老顽童”高莽等，这些篇什闪耀着文学家们的思想火花，更彰显出他们的风骨和情怀。

“1999年大学毕业，我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室从事征集工作，有机会结识诸多文学前辈。他们身上有对文学的坚定信念，有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执着追求，这种信念与执着至死不渝。他们早已著作等身、名满天下，但却一直谦虚好学，对知识的渴望从未停歇。这让我极为敬佩，因此想把与他们交往的细节记录下来，以飨读者。”慕津锋说。

书中，作者感佩周有光先生在百岁还要求自己“终身教育，百岁自学”，百岁后出版了《朝闻道集》《拾贝集》《逝年如水——周有光百年口述》等多种著作；难忘陈忠实先生的忠厚率真、以诚待人、执着不懈，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有生之年写出一本两本死后可以垫棺做枕的书。

除了对文学名家进行素描外，作者着重回忆他们对自己的谆谆教诲，这是前辈们人生智慧的闪现，也启发读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、文艺观。比如，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教授题字“淡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致远”，希望作者磨炼心性，再安静一些；翻译家高莽讲述了母亲82岁时给自己题写“人贵有自知之明”的故事，回忆她如何言传身教，告诫自己认真做事；屠岸先生说“胆欲大而心欲细，智欲圆而行欲方”是自己的座右铭；《小英雄雨来》作者管桦对竹子所代表的君子精神推崇备至等。

慕津锋说：“我希望以第一人称视角，讲述自己眼中的文学名家，进而让读者了

解他们的性格、气质与精神，格局、眼界与视野。令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周有光先生不停告诫我要‘从世界看中国’，要有大局观、世界观，才能有大胸怀、大境界。作家阿来主编《科幻世界》杂志时，竟拒绝香港李嘉诚财团的注资，因为他把这份杂志当作一份事业，担心资本影响到文学品质。书中的人物之所以能取得比较大的成就，与他们的精神品格密不可分。”

此外，因与文学名家的往来多与征集工作有关，作者还通过手稿、图书等捐赠过程的还原，展现出冯其庸、罗浮、萧逸、温瑞安等作家的无私慷慨和超拔境界。



吟诵杜诗有新编

缪俊杰

中国是诗的国度，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耀眼的明星。杜甫7岁咏诗，59岁寿终，共写了1400多首诗（据《全唐诗》，可能还有佚诗），被誉为“诗圣”“诗圣”。为纪念杜甫诞生1310周年，李春林最近出版的《诗人杜甫》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）是一个适时的新读本。该书分31章，以杜甫的生平简历为线索，以诗人作品的创作时间为顺序，略带穿插倒叙，力求以生动形象的笔调，详细介绍诗人一生的主要经历和作品。

李春林《诗人杜甫》的特色，可以用“以诗叙事，以史证诗”来概括。杜甫没有留下自传，但1400多首诗为唐玄宗时期半个世纪的历史留下了清晰的印记。《诗人杜甫》从“六岁观剑，遇公孙大娘”起笔，写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，诗书世家，他曾经遵照“奉儒守官”的家训，早年希望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。因此，他到长安为皇帝献诗，又投考进士，但均未得到青睐，只被委任到地方做一个小官，杜甫并未到任。他为自己“未有涓埃答圣朝”而自愧。

他的性格还有另一面——爱好游历。他曾漫游吴、越、齐、赵，饱览祖国山川胜景。在游历途中又结识了李白、高适等著名诗人，他们在一起饮酒欢叙，吟诗作赋，好不快乐。他一生中经历过战乱，四处奔波，在探家和逃难途中，写下了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以及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等名篇；他同情人民疾苦，写下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等脍炙人口的名诗。杜甫晚年颠沛流离，衣食无着，最后客死湘水舟中。这些苦难的经历，他都写进诗记周详，可以说是“以诗叙事”。杜甫的这些诗从多方面、多角度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和人民的生存状况，折射出时人复杂的心灵轨迹，这正是其诗真实性和艺术价值所在。是其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所在。

李春林在《诗人杜甫》中将杜甫诗作和当时的历史背景、社会环境、杜甫本人的生平经历、诗坛交往等紧密勾连，熔为一炉，用非虚构的笔法和流畅通俗的语言将这位大诗人生动地画出来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杜甫、走近杜甫的良好读本。



谢冕部分著作书影



谢冕编年文集